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委托研究项目成果

# 新时期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的理论与实践

郭广银 杨明 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委托研究项目成果

# 新时期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的理论与实践

郭广银 杨明 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郭广银, 杨明等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 - 7 - 305 - 04993 - 4

I. 新… II. ①郭… ②杨… III.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研究 IV. 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8507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著 者 郭广银 杨 明 等  
责任编辑 杨金荣 莫 菲 编辑热线 025 - 83685411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溧阳晨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3 字数 329 千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500  
ISBN 978 - 7 - 305 - 04993 - 4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2169 025 - 83592317  
电子邮件 [sales@press.nju.edu.cn](mailto:sales@press.nju.edu.cn) (销售部)  
[nupress1@publicl.ptt.js.cn](mailto:nupress1@publicl.ptt.js.cn)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历史回顾

/1

第一节 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与校园文化的初步形成/2

第二节 民主革命时期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历程/14

第三节 建国以来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历程/25

## 第二章 国外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36

第一节 国外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 basic 思想/36

第二节 国外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突出特点/50

第三节 国外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62

## 第三章 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成就、问题与原因/73

第一节 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取得的初步成就/73

第二节 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88

第三节 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98

# 目 录

- 第四章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建构/109**
  - 第一节 高校校园文化的理论定位/109
  - 第二节 高校校园文化的实践功能/119
  - 第三节 高校校园文化的目的指向/137
- 第五章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动力分析/150**
  - 第一节 社会政治发展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方向要求/150
  -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决定力量/164
  - 第三节 社会文化发展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文化熔炉/174
  - 第四节 高校发展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内在动力/182
- 第六章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的基本原则/196**
  - 第一节 方向性和批判性相结合/196
  - 第二节 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结合/207
  - 第三节 全面建设与重点推进相结合/216
  - 第四节 国际化和民族化相结合/224
- 第七章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232**
  - 第一节 营造健康向上的育人氛围/232
  - 第二节 弘扬合乎时代要求的大学精神/242
  - 第三节 成为先进文化的示范基地/253

# 目 录

## 第八章 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262

第一节 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地位  
/262

第二节 高校校园物质文化的功能/271

第三节 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的创设  
/278

## 第九章 高校校园活动文化建设/291

第一节 高校校园活动文化内涵/291

第二节 高校校园活动文化兴起/304

第三节 高校校园活动文化建设方略/313

## 第十章 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326

第一节 高校校园制度文化的涵义与特  
征/326

第二节 高校校园制度文化的功能与原  
则/330

第三节 高校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和  
途径/334

## 第十一章 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342

第一节 高校校园精神文化的内涵/342

第二节 高校校园精神文化的功能/346

第三节 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和  
途径/351

后 记/357

# 第一章 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历史回顾

校园文化,顾名思义,就是在学校里所独有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和系统,是学校教育的产物。高校校园文化则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高校校园文化萌芽于近代大学的出现,并随着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革而演变。从民国初期的科学民主启蒙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再到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我国高校成为先进文化的重镇,引领了社会进步思潮,对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高校校园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高校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伴随着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而逐步形成的。它如同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真实清晰地反映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高等教育的风云变幻。

纵观我国高校校园文化早期的发展历程,每当高校校园文化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社会先进文化保持同步时,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就顺利发展,对国家和社会事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反之,每当高校校园文化背离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时,高等教育事业就会出现停滞的局面,同时也就无法起到和社会先进文化相得益彰的作用。当前,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地回顾近代以来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其发展、变化规律,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第一节 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与 校园文化的初步形成

### 一、天朝梦醒：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与传统教育体系的解体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总体说来，历史上虽然有异域文化的引入，有些文化（如佛教文化）甚至有过与中华正统文化的碰撞，但这些异域文化非但没有对中华文化造成根本性冲击，相反总是被中华文化所同化，从而最终融入到中华文化发展的浩荡大河之中。也许是缘于这样的历史经验，19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朝野上下依然弥漫着一股自尊自大的“华夏中心观”思潮，以中国为天朝上国，视其他国家为“夷”，认为中国典章制度最优越，而外国人皆为未开化民族，徒有“奇技淫巧”。

鸦片战争轰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更惊醒了中国士大夫“天朝上国”的迷梦。他们发现中华民族不惟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更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同时，中国国内吏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伴随而来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古老的东方帝国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在此过程中，沿袭已久的封建教育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清朝继承了以往封建王朝的教育体系，其高等教育的主体为官学和民间书院。官学包括朝廷主办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以及地方性的府学、州学、县学。清朝民间书院在数量和规模上均超过前代，不仅在各省省会均有开设，而且府、州、县也纷纷效法，甚至分布到一些偏远地区。

然而由于清朝实行专制主义与排外主义的文教政策，严格控制思想、钳制民智，重科举而轻学校，使官学和书院都笼罩在沉闷萧条的气氛中。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内外交困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在此形势下，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发展水平的中国封建高等教育已无法为国家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这主要表现在：



### （一）官学成为科举制的附庸，名存实亡

清朝统治者虽然强调育才的重要性，但更重科举，把科举作为官学教育的核心，以维护其统治。这就造成官学教育完全以科举为依托的局面，学校只是为科举做准备，官学成为士子求功名的敲门砖。官学教育的目的就成为应科举以求功名，官学教育的重心不在学校本身而在科举。这就严重阻碍了学校本身的正常发展，产生了消极后果。

首先，官学教学内容脱离现实，空疏无用。清朝科举继承了明朝的八股取士，到了晚清更发展成一套机械呆板的考试格式，考题生僻枯窘。与此相适应，官学的教学内容严重脱离现实，学子们整日埋头于八股、试帖、小楷等应试技艺中，对于国家民生漠不关心，甚至于一些学子连唐宗宋祖是哪朝皇帝都不知道。其次，教师昏庸，教学管理松弛。由于重科举轻学校，晚清官学对教师的选任极不重视，教师里面有些是靠捐钱进入，有些则是不称职的官吏。大批教员根本不具备培养人才的能力，滥竽充数。在有些官学里学生一年都见不到老师一面。同时，随着晚清统治的腐败，官学管理制度松弛，很多官学教学活动稀少，有学校之名而无学校之实。学校教学水平普遍质量不高，严重削弱了学校的教育功能。再次，官学舞弊抄袭成风，学风颓败。官学士子在科举功名的诱惑下，往往舍本逐末、急功近利，把经典束之高阁，整日埋首八股文等应试技艺。晚清科举考试舞弊现象严重，作弊手段集历代之大成，弄虚作假，贿赂成风。

### （二）书院日趋腐败，积弊丛生

书院教育原本相对独立，多以讲究儒家经典的圣贤之学与经世致用的实学为主。清朝为加强思想控制，规定书院山长的选聘权由政府官员掌握，这就造成了书院的官学化倾向。随着晚清政府的腐败，地方官员利用山长聘任权徇私舞弊，所选书院山长多庸陋无学，滥竽充数。同时，书院教育的内容也以八股文为主，与官学一样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属品。由于书院里的学生多数清贫，为使学生安心向学，书院一般要向他们发津贴以维持个人生计，称为“膏火”，膏火的多少视各书院的经济状况而定。到了晚清，许多学生进书院，完全为了得到微薄膏火以求糊口，甚至出现六七十岁的老生徒为求生依然在书院“苦读”的现象。本以“兴贤育

才”为初衷的书院竟然成了社会的养老院和救济院,反映了晚清书院教育的衰败现实。

与此同时,随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所展现出的强盛国力,以及西方传教士开始在内地拥有传教权,促进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局面。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一系列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采用的是以西方学制为框架、以宗教教育为基础的办学模式,教学内容则以西方的科学知识为主,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引起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这些教会性质的学校中比较有名的是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的格致书院以及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书院。这些教会学校先进的办学模式和教学内容,与我国传统的书院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引起了当时著名洋务官员和改良人士,如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的重视与支持。此外,西方传教士通过在內地的教会、江南制造总局和京师同文馆等机构在我国进行了西书编译活动,使当时的洋务官员与维新人士广泛接触到西学,从而对我国传统教育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高等教育变革的催化剂。

官学和书院衰落腐败的事实说明,封建高等教育体系已无法有效地承担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教育使命和功能,更无法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和挑战。因此,当时以魏源和张之洞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人士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提出了“师夷长技”和“中体西用”的口号,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教育运动,由此促成了近代意义上大学的产生。

## 二、救亡图存:近代大学堂的建立与高校校园文化的萌芽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当时清朝的一批官僚意识到西方的优势所在。他们打着“自强新政”的旗号,开始创办“洋务事业”。在教育方面,洋务派官员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办“西学”,建立新式学堂。但当时的洋务派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仅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军事。他们眼中的西学,不外是“西文”(西方的语言文字)和“西艺”(使用和修理洋机器、枪炮和舰船的技术)。因此洋务派所创办的学校大体上分为三类:外

国语学堂,主要培养翻译人才(如1862年清朝开办的京师同文馆),属于语言专科学校;技术学堂,主要培养使用和维修洋人机器的人员(比较出名的有1866年左宗棠创立的福建船政学堂、1877年曾国藩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下设的机器学堂、李鸿章于1879年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可归于工业专科学校之类;军事学堂,培养海陆军指挥人才和使用洋枪洋炮的人才,海军方面有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陆军方面则以1885年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为代表。

洋务派于1870年到1890年间所开办一系列洋务学堂,虽然局限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且片面地追求“师夷长技”的功利目的,但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上对于传统封建教育体系是一个重大突破,客观上广泛传播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于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正式诞生起到了推进作用。但随后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同时也宣告了以“中体西用”为指导的洋务教育的失败。

维新派人士继洋务派之后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以救亡图存为号召,指出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文化。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指出洋务派只知“增新”,不言“变旧”,实乃“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由此,他们要求清朝“废科举、开学堂”,主张在教育模式上全面学习西方,创办中国自己的大学教育,以开“民智”、育“新民”,培养符合国家和时代需要的新式人才,从而拉开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1895年,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大学——北洋大学堂在天津成立,催生了高校校园文化的萌发。

北洋大学堂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标榜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抛弃了“中体西用”模式,而以美国大学为模式,以“西学体用”为办学方针。学校一切设置皆以美国名校哈佛和耶鲁为榜样,并聘请美国教育家C. D. Tenney为学校总教习。北洋大学堂以区别于当时各式学堂的办学方针成为中国人所创办的第一所名副其实的新式大学,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式大学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校园文化的萌芽。北洋大学堂不仅学制完全仿效美国大学,采用了大学预科制,并且在学科设置上不

拘一格,将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如,为满足当时清朝的外交需求,特设法律科;为适应当时“实业救国”的需要,开设了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三科;在组织教学过程中,严格教师聘请和招生,制定了严格的教师考核制度。因此,北洋大学堂的教师多具有真才实学,形成了严谨的教学风格和传统。在挑选学生方面,也以宁缺毋滥、入学考试严格著称。1907年北洋大学堂在上海、汉口、广州等地斥资做广告招收本科生,结果只有一人及格,为保证学生质量,最后只录取了这一人。入学之后,等待学生的是严格的考试制度,学校升级考试如有一门不及格就要留级。据记载,学校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留级,甚至退学。这促使学生入学后就毫不松懈地埋头苦读。北洋大学堂以优良的师资、出色的生源和学生扎实的学业成绩赢得了社会的承认。据统计,1901年到1907年间,全国公费留学生北洋大学堂占了半数以上。从学校建立到抗战初期,欧美许多大学都明文规定承认北洋大学堂的学士学位,该校留学生可免试直接进入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大学来说,是罕见的殊荣。这一时期,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清朝设立的一些新式学堂以北洋大学堂为榜样,开始注重学制建设。

作为百日维新运动的惟一成果,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办学章程明确规定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但直到1902年之前,京师大学堂在实质上仍相当于旧式封建书院。《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为了缓和国内矛盾,维护自身统治,清朝被迫推行“新政”,宣布逐步废除科举制度,并恢复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书院为高等学堂。1902年8月,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是我国第一次以官方名义颁行的完整学制。1903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举行了入学典礼,正式开学。1905年4月20日,京师大学堂举办了我国近代大学第一届学生运动会。值得一提的是,1902年,重建后的京师大学堂学生举行集会,谴责沙俄侵略我国东北,为后来我国高校学生运动开了先河。

直到清朝灭亡,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只有4所,其中北洋大学堂在清亡时仅培养出法律毕业生9名,京师大学堂虽然成立于1898年,但直到辛亥革命以前尚无本科毕业生。由盛宣怀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南

洋公学上院(相当于大学本科)截至清朝灭亡时也没有本科毕业生。这一时期的大学无论从学校制度还是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来看,虽然离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要求尚远,还处于封建学校向现代大学转变和过渡的阶段,却成功地为民国时期的大学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体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为了使国家民族免遭列强瓜分,本着国家富强的信念,以“救亡图存”为号召,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康有为认为,学校能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是立国之本,中国改变落后局面的关键,首先就在于变革落后的学校教育。他主张学校教育应德智体均衡发展,中西兼学。梁启超同样也把开办新式教育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手段,认为教育是强国的根本,教育的宗旨应该是以培育“新民”(即具有新思想、新道德、新精神的国民)为目标,变革传统教育陈旧僵化的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主张建立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是一位教育救国的倡导者,主张以教育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sup>①</sup>的教育思想。

这一时期由于旧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教育制度的确立,新式大学已初步成为社会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把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高等教育上,把高校校园作为传播先进思想和观念的主要阵地。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新式大学的学生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处于萌芽期的高校校园文化确定了基本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开民智,育新民,救亡图存。这使我国高校校园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紧紧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先进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

这一时期的高校校园文化虽然还未正式形成,但已可零星见诸史料。由于西方文化的传播,在一些学校里出现了早期时事新戏剧演出活动。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新戏剧,演出方式同传统戏曲迥然不同,受到观众的好评,被认为是中国早期话剧的先驱,初步展示了早期高校校园文化勇于创新的风采。

---

<sup>①</sup>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

### 三、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时期高校校园文化的两面旗帜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得以摆脱封建教育束缚，比较完整的新式高等教育制度逐步确立，中国开始真正致力于建设具有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权的现代大学。20世纪最初的20余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奠基时期。高校校园文化也真正开始步入了它的形成期。

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意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同时公布了教育会议所决定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不久教育部颁布了有关高等教育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新教育体制的确立和教育理念的转变，使刚刚起步的校园文化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进步色彩。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使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代表了这一时期高校校园文化的最高成就。

民国之初的中国大学仍然死气沉沉，弥漫着严重的封建复古思想。以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郭秉文（南京高师校长）、周诒春（清华学校校长）等为代表的教育家开始向西方大学高等教育传统学习，厉行改革，推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先进理念。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军阀混战，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而首倡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又为这一时期的高校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和空间。

曾留学德国并深受现代大学之父洪堡的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几年间，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下，北大网罗了大批思想学术大师。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唤起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因而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文化这个内核上建构新的社会体系，成为现代社会的起点。

蔡元培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转折关头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将充满官僚习气的旧北大，改造成为民主与科学策源地的生机勃勃的新北大，为中国现代高校树立了楷模。他采取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吸纳不同政治背景、学术渊源、学术派别的学者，鼓励求同存异，各得其所。他主张，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构建起大学自治的核心内容——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从1917年开始，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逐步设置并完善了评议会、各学科教授会、行政会议等组织架构，以各科学长和教授若干人组成评议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以行政会议作为最高行政执行机关，从组织上保证了学术自由的实施。蔡元培缔造的大学自治理念及其原创性实践，被他的后任蒋梦麟、胡适等人继承发扬，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注入了理想与灵魂。

在教育理念上，蔡元培批判了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为变革当时北大遗留的封建习气，培养师生高尚情操，蔡元培于1918年发起组织了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甲等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当议员为乙等会员；再加不饮酒、不吃肉、不抽烟为丙等会员。进德会吸引了大批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的参加，对于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风和学风的转变产生了积极影响。蔡元培还非常注重美育，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为了培育学生对美育的兴趣，聘请名画家和音乐家来学校对学生进行指导，大大丰富了学生的精神世界。学校开展体育、书法、音乐、图画等文体活动，组织各种学生团体和学术刊物，经常举行各种学术专题讲座，介绍新知识、新思想、新学说。蔡元培所施行的这些改革措施，为当时的北京大学营造了宽松、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和校园氛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民族精英都聚集于北京大学，从而使当时的北大校园文化活动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新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方针为北大校园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校园文化的成功开展所创造的开明氛围又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1914年袁世凯称帝，实行个人独裁，并以孔教为国教，强化思想专制，在当时的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封建势力的复古逆流，打破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幻想，迫使他们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他们意识到，没有基于多数国民觉悟之上的社会心理基础作为民主共和制度的基础，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家的。由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涣散，且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斗争，因此对于复辟势力的

反击显得有心无力。这时文化教育界的学术精英异军突起,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文化人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精神,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以北京大学为主阵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向封建复古势力发起了猛烈攻击。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以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和彻底性对落后腐朽的封建思想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批判和清算,从而为刚刚起步的高校校园文化进行了第一次思想启蒙。

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斗争主要沿两个方向展开:猛烈抨击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旧教育;建立以科学和民主为中心的新教育。清朝灭亡后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无论是袁世凯复辟帝制还是康有为等人的反对共和,都是打着孔孟的旗号进行的,孔子成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护身符。因此,要进行思想解放,提倡新教育,就必须把这个偶像打破。由此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认为,儒家道德只是奴隶道德,只对维护封建专制有利。鲁迅则用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和鞭挞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另一员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吴虞指出,儒家教人以忠孝为本,其实是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还从经济角度分析儒家学说已经不适应当代的中国社会,并对封建复古势力借尊孔为名大搞文化专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在严厉批判封建复古主义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精英们大声疾呼建立以科学和民主为中心的新教育。科学和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科学精神即工具理性,而民主是价值理性的政治内容,它们都是启蒙理性的组成部分。此外,新文化运动还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以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

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尤其对高校青年学生影响巨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创造了条件,为后来的五四爱国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启蒙。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广大高校学生掀起了争取民主自由、追求真理、追求新知识的热潮,形成了关注社会民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他们寻找各种先进思想,探索挽救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和民族的



道路。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一时期,形成期的高校校园文化在接受启蒙思想洗礼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中国社会启蒙思想的前沿阵地。

#### 四、反帝反封建:高校社团兴起和五四爱国运动

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高校校园文化发展历程中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学生社团兴起、期刊林立,全国高校学生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共同行动,并肩战斗。这标志着高校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形成了独立鲜明的群体意识。从此高校成为先进思潮和中国社会的桥梁,成为民主革命的先锋。

在新文化运动的号召下,青年学生们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自1917年到五四运动前,全国高校里出现了不少社团。1918年7月,全国学生在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过程中,成立了学生救国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前身)。北大学生组织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介绍西方思潮,批判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同年10月国民社在北大成立,并出版《国民杂志》,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国民社成员中有邓中夏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其中大多数成员成为后来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1919年3月,邓中夏等成立了平民讲演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为宗旨,在活动开展中,其内容从一般的科学知识普及逐渐向政治宣传倾斜。少年中国学会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的社团,成立于1918年6月,以振奋少年精神为宗旨。在其他省市的学生社团中,以毛泽东于1918年发起的新民学会最为著名,学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1920年以后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些由先进青年组织的团体均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成立,他们在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指导和影响下,积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社会的改造道路,开展爱国活动,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推动的思想启蒙的产物,其直接导火索是由于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失败。高校学生激于爱国义愤,以